

纹饰层累与多元一体:文化共生视域下 广西铜鼓文化中的“三交”实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实践系列之三

郝国强 李星莹 赵新欣 戚可夫

【摘要】铜鼓文化是红水河流域各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传统文化,其发展和演化体现出多民族文化的共生性,这种共生关系丰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依托广西河池国家级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铜鼓文化融入经济发展当中,有效促进文创产业发展。广西铜鼓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促进了各民族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构筑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助推了各民族互嵌式发展,增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

【关键词】铜鼓文化;纹饰层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郝国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首席专家;李星莹,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赵新欣,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戚可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 南宁 530006)。

【原文出处】《广西民族研究》(南宁),2023.4.148~158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容融之道:古商道与各民族的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五个互嵌’研究”(22VMZ005)、广西哲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代化道路与广西各民族五个互嵌研究”(22BMZ016)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9月,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各民族共享文化的研究,并从各民族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挖掘、整理与阐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元素。广西位于中国南方,是稻作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亦是历史上的“百越之地”,诸多民族和多元文化曾在此交汇,如今拥有“刘三姐”歌谣、壮族“三月三”等各民族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一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图像。其中,河池铜鼓文化作为红水河流域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是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文化共生的经典案例。

铜鼓文化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广泛分布,尤

以红水河流域最为集中。河池市处于红水河流域的核心地带,境内铜鼓文化资源丰富,活态传承形态完整,形成了以铜鼓文化为核心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其中,壮族铜鼓习俗(广西河池市)、壮族蚂拐节(广西河池市东兰县)、瑶族祝著节(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等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西铜鼓文化在红水河流域显现出邻近地区各民族对铜鼓具有共同拥有、使用和对铜鼓活动共同关注、参与的特点,并成为各民族共传共享的特色文化符号。^[1]河池市是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有汉族、苗族、瑶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世居民族,总人口433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达83.93%^[2],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聚居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丰富、代表性项目最多的地区之一。河池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总量达8740个^[3],2013年申报成立了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广西多民族聚居的格局环境下,广西铜鼓文化的发展体现出多民族文化的共生性,这种共生关系不仅丰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平台。

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种可塑状态;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4]文化共生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同文化之间不是互相排斥、互相消灭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的。^[5]文化共生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强调多种文化要素的联结、共栖和共存,主张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文化共生理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叉研究正日益受到重视,其中包括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方面,研究者通过文化共生理论的视角,探索了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蔺海鲲、哈建军认为多元文化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是人类社会实现文明共鉴、和谐共荣的核心理念,体现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文明交融互动的发展机制和人类文明发展中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力。^[6]方堃、明珠认为中华文化的历史变迁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共生特征,建构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共同体意识需要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出发。^[7]另一方面,文化共生理论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持理论,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政策制定和推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么加利、付倩基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内在机理在于文化的化育功能,包括涵化主体共同信仰、培育人文共生观念、铸牢民族团结意识、塑造民族文化品格等方面。^[8]梁军、史钰泽以广西为例,阐述应从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倡导兼容并包的共生交往观、营造互惠平衡的发展环境、完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等四个方面维系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局面。^[9]韦亮节、黄家信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壮汉语言共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生态,这种语言生态通过跨民族身份建构的方式,塑造族群认同,凝聚共同体意识,推动民

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0]

上述学者的成果为深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学科、民族和地区,这为后续从文化共生的整体性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提供了空间。本文从文化共生的视角,以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为田野点,一方面从历时性的角度阐释广西铜鼓如何从一个简单的烹饪器物转变为多民族共传共享的文化符号、铜鼓文化的功能和象征意义如何在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演化和发展;另一方面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整体性保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实践及其意义。

二、层累演进:广西铜鼓文化的演化与发展

铜鼓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文化形态,其历史可以追溯至青铜时代。作为一种物质文明,铜鼓文化在人类掌握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的基础上出现,反映出了当时使用铜鼓民族的科技发展水平。同时,铜鼓文化也与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地域的民风民俗以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传播地域上,红水河流域共同拥有铜鼓的地区往往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血脉相通,社会结构相仿,容易形成共享的铜鼓文化。铜鼓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见证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辉煌,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历史演化:铜鼓文化传承中的各族共创

在青铜文化的演化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对青铜的使用早在距今4000年到3500年前就开始出现,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三个地区: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北方地区的辽宁和河北一带,以及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的河南和山西。^[11]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冶炼技术与中原同时发展,一些地区甚至领先于中原。^[12]铜鼓作为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考古资料,云南楚雄万家坝型铜鼓造于2700余年前的春秋早期,为出土最古老的铜鼓,源于滇中偏西一带。^[13]其中,各个民族在冶炼技术、铸造工艺和艺术形态等方面相互交流、融合,进而创造出丰富多样的铜鼓文化。

一方面,百越民族共同推进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共同形成多彩多样的铜鼓文化。百越民族是中国南方的重要族群之一。其中,于越是最早的一支,也是文化最发达的一支。于越与干越一样,拥有早期冶铸工艺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吴国被越国征服,于越族人不仅控制了铜矿基地,还吸取了吴国的先进冶铸技术,包括聘请了吴国和干越原有的铸师名匠。这使得于越的金属冶铸工艺得到了飞跃发展,在越王勾践的宝剑铸造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技艺。^[14]在铸造工艺方面,吴越也较成功地掌握了铸造不同器具所需的不同铜、锡、铅配方比例的先进技术。在商周时期,长江两岸的扬越、干越和于越等百越族人不仅向中原地区输送了大量的铜料资源,使黄河流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青铜文化,也在南方的百越民族地区,特别是扬越、干越和于越的分布区内,发展了自身的冶金术,与黄河流域有着同样古老的历史传统,可以视为中国冶金技术最早起源地之一。^[15]其次,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发达的冶铸技术逐渐传播到发展较为滞后的南方地区,大幅缩短了岭南先民掌握青铜冶铸技术的过程,从而促进了铜鼓文化的多样化和精美化发展。考古发现显示,青铜器出土的地点明显增多,说明岭南地区的青铜铸造水平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6]除此之外,1974年在广西武鸣县出土的兽面纹提梁铜卣,其纹饰整体特征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是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交流的见证。^[16]秦朝统一岭南后,大量先进的冶铸技术不断注入该地区,推动了岭南青铜铸造工艺达到新的高峰。例如,骆越地区与内地在铸造工艺方面采用了类似的全范式和内模外范铸造法。^[16]

另一方面,在铜鼓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楚国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楚国的青铜冶铸业发达,对骆越地区的青铜文化影响深远。广西铜鼓文化最早见于右江流域。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最早出土于田东县祥周乡的两面万家坝型铜鼓,墓葬所属时代为骆越人在右江流域的居住时期。秦代以前田东属百越地,春秋战国时期属骆越,骆越被楚灭亡后归楚管理,《史记》中载有楚悼王曾派兵南平百越之地。^[17]在这一时期,楚国青铜器的传入为骆越地区带来了文明的信息,催化了骆越地区青铜文化的产生。而后,骆越人逐渐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在春秋晚期或

战国初期开始铸造青铜器,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青铜文化。关于骆越青铜文化与中原及滇池文化的关系问题,从桂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云雷纹和夔纹等纹饰上看出,商周文化早期就已传入骆越地区,与中原及滇池地区的文化存在着交流与影响。^[18]再如,靴形钺与云南晋宁石寨山、楚雄万家坝和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半月形铜钺相似,这表明骆越青铜文化是骆越与南方各地人民智慧结晶。^[19]

综上所述,铜鼓文化是各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古代滇、濮、骆越民族与中原地区联系密切。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青铜技术的传播和艺术的创新,为铜鼓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些文化交流与融合不仅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也丰富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功能变迁:从炊器、乐器到礼器

铜鼓之所以能够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遍布中国的红水河流域乃至亚洲的东南亚地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满足了农业社会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诸多需要,因此能够在各民族地区得到不断的传承与创新。随着社会的发展,铜鼓的功能也在不断变化,从最早的炊器,到歌舞伴奏的乐器,再到祭祀、庆典活动以及象征财富和权力的礼器等。

铜鼓源于铜釜,曾被作为炊器使用,早期的万家坝型铜鼓形制比较原始,且基本均为素面或仅有很简单的几何纹、爬虫纹和云头纹等装饰。铜鼓从炊具向乐器转换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历朝历代的史书、诗歌更不乏“铜鼓”伴以为乐的记录。例如,广西花山岩画中含有铜鼓图像368个、羊角钮钟图像11个^①,其中就有铜鼓与羊角钮钟结合的形象,图像中的两种乐器可能用于配合演奏;《南州异物志》记载:交广之界的乌浒人“击铜鼓,歌舞饮酒”,生活在广西的北海、钦州、玉林等地乌浒人敲击铜鼓,唱歌、跳舞,以助酒兴。^{[20][143~155]}铜鼓作为乐器,自诞生便与铜鼓舞同在乐舞场面中出现,在祭祀仪式上,铜鼓舞被作为一种媒介,用于沟通天地神明,祈祷丰收,驱邪避疫等;在庆祝活动中,铜鼓舞则用以表示人们的喜悦和祝愿。例如,在花山壁画上,就绘有壮族先民跳铜鼓舞敬神的祭祀。到了现代,铜鼓

舞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常常出现在民俗节庆、文化活动等场合中。铜鼓舞作为民俗也被不同省市不同民族共享,包括云南省文山壮族铜鼓舞、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瑶族铜鼓舞和南丹“勤泽格拉”铜鼓舞、贵州省雷山苗族铜鼓舞等。

除此之外,铜鼓还被用作战鼓和朝贡的战利品。《隋书·地理志》载:“俗好相杀,多构讎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121][1888]}说明铜鼓作为作战武器时,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宋史·蛮夷二》中有关莫氏土官进贡河池铜鼓的记载:“(莫洪皓)遣其子淮通来贡银碗二十,铜鼓三面,铜印一钮。”^{[122][7275]}即河池铜鼓在元代时期被当作朝贡的贡品之一。在《陈书》的《欧阳頔传》中记载:“(欧阳頔)常随(兰)钦征讨……钦南征夷僚,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123][157]}欧阳頔将缴获的战利品上贡,包括有历代都未见过大铜鼓。既然参与了军国大事,铜鼓自然也是国之重器和权力的象征。据《明史·刘显传》载:“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124][5620]}出土于广西北流市的西汉云雷纹大铜鼓是世界上现存体积最大的古代铜鼓,公认为“铜鼓王”,关于北流型铜鼓《广州记》中记载:“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广丈余。”^{[125][48]}这段话记载了东晋时代广州境内的俚僚人铸造铜鼓的仪式,体现了古代南方民族首领对于王权的追求达到了巅峰。

(三)交融共生:纹饰层累中的“多元一体”

铜鼓作为民族文化载体,在传承中既保持了岭南文化传统风格 and 特点,也在传播过程中融合中原文化不断衍生出新的功能以及形态,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体现。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铜鼓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随着铜鼓文化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铜鼓文化逐渐成为多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文化符号,既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参与文化创造的过程,也反映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在铜鼓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为铜鼓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例如,河池市内的壮族、瑶族、苗族等民族都有铜鼓舞的传统,这些舞蹈在地域和民族特点上各具风格,但都以铜鼓为核心元素,彰显了铜鼓文化的共享性。同时,在铜鼓制作和工艺

上,不同民族也有各自的特点和传统,共同丰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和形式。总之,铜鼓文化在红水河流域的广泛传播和多民族共享特点,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共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标志。

首先,从传播的地域范围来看,现代铜鼓文化圈以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为核心,辐射红水河流域乃至东南亚地区。铜鼓文化是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铜鼓文化圈涵盖了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份,以及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铜鼓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和多民族的文化共生,也反映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深厚友谊和密切交流。从目前与铜鼓有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来看,红水河流域共有7项: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铜鼓十二调;贵州省贞丰县的铜鼓十二调;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铜鼓舞(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的铜鼓舞(田林瑶族铜鼓舞);贵州省雷山县的铜鼓舞(雷山苗族铜鼓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的铜鼓舞(南丹勤泽格拉);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的壮族铜鼓习俗。在当前众多传统文化趋于濒危的背景下,铜鼓文化展现出了其仍然“活态”的特征,在广西壮族的蚂蛭节、云南富宁彝族的跳宫节、贵州布依族的砍嘎、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铜鼓节、西江苗族的鼓藏节、傣族的蛤蟆节等活动中,铜鼓都是不可或缺的。^[126]铜鼓文化的繁荣不仅源于民族地区的传承和发展,也得益于跨国界、地域的影响与互动。它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文化形式,承载着民族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传承和社会凝聚力等重要功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通过互相交流、借鉴和合作,共同创造了一个活跃而多元的文化场域,为铜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各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铜鼓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象征。它起源于古代的中国南方地区,主要涉及中国的汉族、壮族、苗族、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彝族、傣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这些民族之间发生了频繁的交流与互动,铜鼓文化在这些民族之间传播和传承,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化标志和象征。因此,铜鼓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发展和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它见证了各民族间的和谐共处、互相尊重和共同进步的历史进程。在当今社会,保护和传承铜鼓文化,不仅有助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有助于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再次,铜鼓纹饰中的南北文化融合。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大体上分为3步: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以华夏族团为核心扩大而成的汉族形成,第三步是南北两个统一体的融合。^[27]铜鼓纹饰的演化恰恰可以体现中国南北文化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做文化的注脚。宋元时期,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铜鼓纹饰上出现了儒家(如龙纹、鱼纹、寿字纹、四出钱纹等),道教(游旗纹、符篆图、八卦纹、十二生肖纹等),佛教(莲花纹等)文化符号。其中,游旗是道教的旗幡,象征道教的信仰;^{[28][40]}符篆是道士用于“驱鬼招神”的“天书”;^{[29][63]}十二生肖装饰题材,是受道教影响的产物^{[29][36]}。它们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麻江型铜鼓,此时的铜鼓趋于平民化和世俗化,装饰简约,布局松散。^[29]这些纹饰在鼓面上的交织呈现出儒、释、道交融的特征,彰显了中华文化“三位一体”的深层结构。同时,岭南铜鼓对纹饰的运用也显现出骆越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是古骆越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有力佐证。此外,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还体现在中央王朝对南方边疆的治理上。《滇黔志略》卷27记载:“马湖之彝……春秋焚侯故地,汉为西南彝部,叛服不常。诸葛武侯征抚之,置铜鼓埋镇诸山,稍就帖服。”^{[29][350]}中原利用铜鼓在岭南地区的神灵作用,治理边疆的反叛。朱国桢《涌幢小品》也指出“凡破蛮必称获诸葛铜鼓”^{[30][652]},说明了铜鼓在岭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权力象征地位。中原王朝充分利用这些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收服蛮夷之心,为中央王朝在南方边疆的治理和统治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31]通过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融合,铜鼓成为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后,铜鼓纹饰的层累现象体现了铜鼓文化的多元一体。铜鼓的纹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层

层累加的现象,从最初的万家坝型开始,铜鼓纹饰图案越来越复杂多元,内涵也越来越丰富。铜鼓的装饰文化是铜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题选择和纹饰演化,受到各地区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影响。铜鼓上的每个装饰都是族群内部生活内容的缩影,它们记录了人们祭祀信仰、生产劳作、战争征伐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事件,例如,在中原道教文化的影响下宋元时期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鼓面上出现了由羽人舞蹈纹演化而成的游旗纹,在广西少数民族图腾信仰及中原铸造技术的影响下汉代出现了由中原兽纹演化而成的蛙塑像、鸟塑像(如图1),这是体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文化共生的重要历史见证,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符号价值和象征价值。具体来看,铜鼓分为两个系统八种类型,形状多为圆形或近似圆形,中间鼓腰稍微收紧,外观常铸造有各种纹饰和图案。早期万家坝型是最原始的铜鼓,花纹简单而古朴,太阳纹仅有光体而无光芒,鼓腰由线条分隔成几个空格。鼓身内壁有单线勾画的菱形格子、爬虫纹或云头纹。云南石寨山型铜鼓、广西冷水冲型铜鼓、贵州遵义型铜鼓和越南东山铜鼓中开始出现形象生动的翔鹭纹、羽人舞蹈纹等现实生活描绘,其中翔鹭纹是古代骆越人尊崇的“雏鸟”图腾象征。历史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以鹭鸟作为装饰的革鼓。因为鹭鸟飞行时秩序井然,其蕴意恰好迎合铸造石寨山型铜鼓的滇国奴隶主的需要。^{[29][16~17]}以上铜鼓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主晕均保留了翔鹭纹,并添加了本民族的新元素。越南东山铜鼓在鼓面上加入祭祀图,冷水冲型铜鼓在鼓面添加上蛙、牛、龟等图腾,遵义型铜鼓加入同心圆纹、雷纹、树叶纹等几何图案。

综上,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纹饰逐渐形成了层累式的结构。最初的纹饰以太阳图腾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各地民族特色元素,如翔鹭纹、羽人舞蹈纹等,越来越瑰丽而繁缛的纹饰反映了先民对形式美和装饰美的追求。此外,造型也越来越复杂,鼓面出现立体青蛙、乘骑、水禽和龟等动物塑像。鼓腰、鼓内壁和鼓足等处均出现精美的纹饰。根据历时性与共时性视角制作的铜鼓纹饰的演化图中可以看到其层累结构中的多元一体格局:其一,铜鼓文化的一体性体现在其共同的功能、造型和纹饰(太阳纹),多元

性体现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铜鼓纹饰的差异性。铜鼓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复合体,是各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中华文化符号。其二,铜鼓纹饰的层累结构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铜鼓文化自春秋时期从云南传入广西,在越人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延续至今经久不衰。其三,铜鼓文化还体现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以及南方各民族的文化共生,这种共生关系使得铜鼓纹饰中的一体和多元得以充分体现。

三、鼓韵交融: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内的民族“三交”

河池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位于广西西

北部,由红水河系、龙江河系两大水系组成,红水河沿岸的村落几乎村村有铜鼓,红水河将沿岸各民族连成一个整体,是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通过贸易、移民和文化互动等形式,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三交”实践。

据统计,全世界铜鼓数量约有2400多面,河池现藏传世铜鼓就有1458面,占世界铜鼓藏数的二分之一。^[32]河池是传世铜鼓分布较为集中也是铜鼓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包括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县(538面)、南丹县(380面)、大化瑶族自治县(274面)、巴马瑶族自治县(141面)、天峨县(41面)等。^{[33][208]}为了有效地保护铜鼓文化,河池市于1997年发布了《关于保护民间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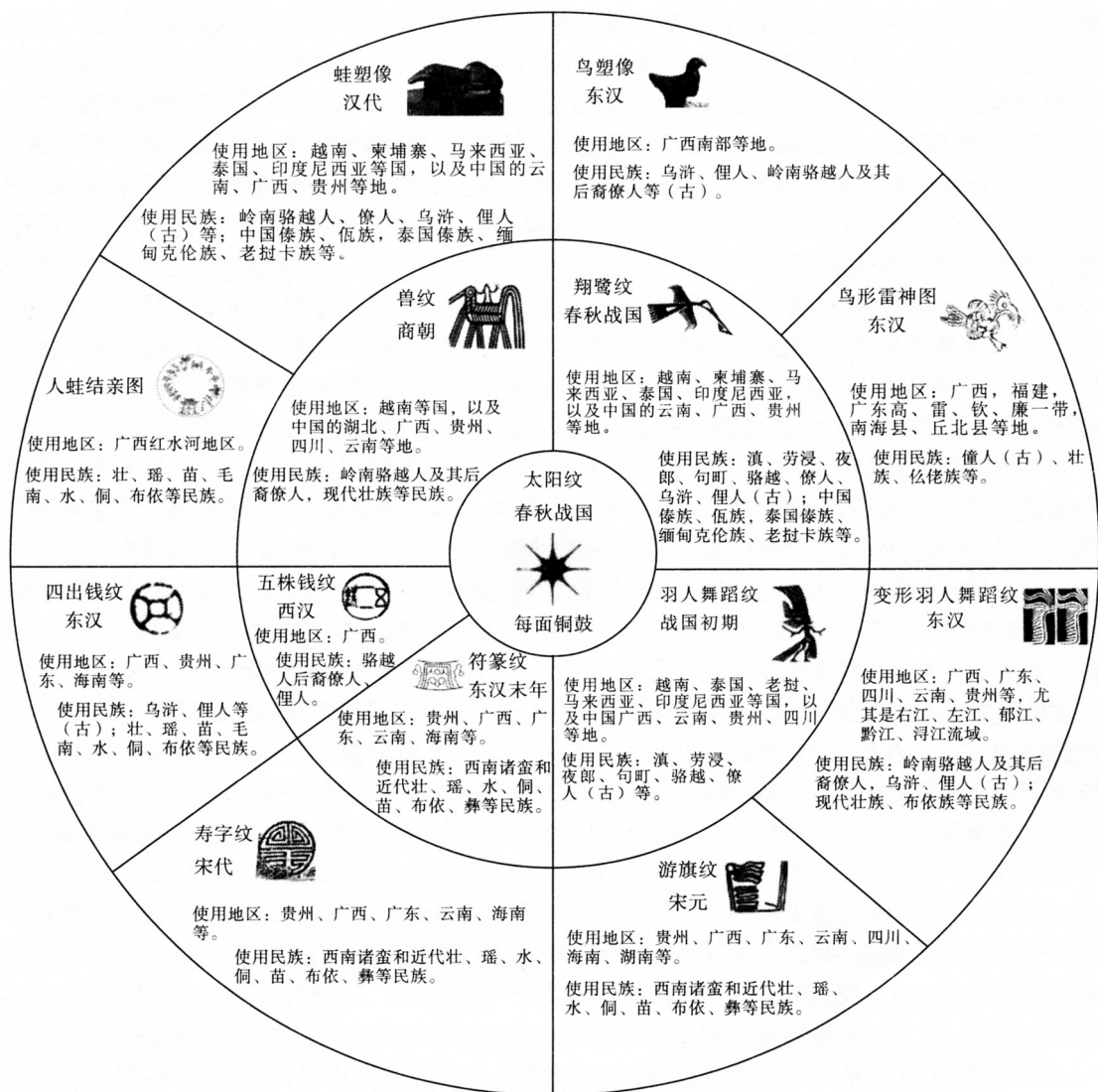


图1 铜鼓纹饰与立饰的演化图

世铜鼓的通知》，并决定于1999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的铜鼓山歌艺术节，由河池11个县市区轮流承办。2004年，为了更好地推行保护工程，河池市在东兰县和南丹县分别建立了铜鼓艺术生态保护村，同时设立10个铜鼓传习班。^[34]2007年，在实施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保护工程中，河池市政府对“每面铜鼓的主人、产生地点、类型”进行图文记录并录入系统，实现了对每面传世铜鼓的有效管理。2012年，原文化部批复设立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实验区保护范围涵盖河池市全境11个县(区)。^②实验区既包括保护铜鼓习俗及其他非遗项目，也保护孕育发展铜鼓文化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2019年颁布实施《河池市民间传世铜鼓保护条例》，促进了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壮、汉、瑶、仫佬、毛南、苗、侗、水族生活在山水之间，这里是各民族民众栖居共生的家园。红水河流域和龙江河流域拥有民族特色浓郁、积淀深厚、自成一体的文化类型。在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历久绵长，蚂蚱(农耕)文化、长寿文化独具特色。沿红水河，瑶族支系的白裤瑶、蓝靛瑶、布努瑶文化，次第排列，构成瑶族文化走廊。在龙江河流域，壮族刘三姐山歌文化、仫佬族文化、毛南族文化并立，实验区建设尊重各族民众的选择，保护各族民众的权益。近年来，河池市针对铜鼓文化的生态实验区建设不断取得进展，包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9项，自治区级42项，市级87项，县级424项。多项措施得到了推进，包括建设和命名5个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5个非遗代表性项目传习所、5个铜鼓文化生态保护村、5个非遗保护传习示范户，以及培养50名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等。在这些努力的推动下，河池铜鼓也开始走向全国和世界，多次在省(自治区)、市、县舞台表演，并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历史价值，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资源丰富，保存着数量较多的传世铜鼓，与铜鼓密切相关的仪式、习俗以活态传承形态存续。实验区里的各民族在铸造和命名、启用和收藏铜鼓中，在婚庆、造屋、丧葬、节庆等场景对铜鼓的应用中，展现了地方民俗文化的丰富性，契合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和融合。首先，在铸造方

面，广西环江韦氏兄弟铸造厂自1999年挂牌以来，“新型铜鼓模具”“铜鼓铸造工艺流程”等方面获得国家专利，现已产销数万面铜鼓。他们不仅研制出能敲出26个音、更适合演绎的音乐铜鼓，还铸造出全世界最大的铜鼓，并成功注册了“韦氏鼓王”商标品牌。在命名习俗方面，南丹瑶族支系白裤瑶群众买回铜鼓时为铜鼓举办“萨欧别”^③仪式，反映了人们对铜鼓文化的重视和珍视。其次，在启用和收藏习俗方面，河池铜鼓文化作为一种仪式文化，启用铜鼓仪式和收藏铜鼓仪式不仅彰显了人们对铜鼓文化的崇敬和敬重，也为文化传承打开了新的局面。此外，多种婚庆、造屋、丧葬、节庆等场景中都有铜鼓应用习俗。在婚庆习俗方面，壮族、瑶族支系布努瑶使用铜鼓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在丧葬习俗方面，瑶族支系白裤瑶、布努瑶以及苗族和部分壮族有丧葬使用铜鼓的习俗，反映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追思和缅怀；在节庆习俗方面，铜鼓也成了春节、壮族蚂蚱节、瑶族年街节、瑶族祝著节、苗族丰收节、壮族敬牛节等多个节庆活动中的重要文化符号和用品，给活动增添了欢乐和庄重的气氛。可见，铜鼓文化在河池地区呈现出壮族、瑶族、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个民族共享共传的鲜明特点。

在保护实验区范围内，铜鼓文化超越民族、地域的分类系统，是具有引领性的核心文化类型，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铜鼓习俗本身贯穿于各民族文化之中，铜鼓与各族民众的节庆习俗、歌舞娱乐、民间传说与神话、地方信仰密切相关；其二，铜鼓文化所呈现的礼乐合一、多族共享、深植乡土、崇祖敬老、聚众同乐的特征成为整合文化资源的基础与标准。从铜鼓习俗本身出发，设置铜鼓文化带，整合与铜鼓、铜鼓习俗密切相关的文化资源。在这过程中，河池市更是凭借其铜鼓数量多、使用民族多并与当地节日联系密切、铸鼓技术高超和保护措施完善等多方面的优势，并在国家级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整体保护下，传承和发展河池铜鼓文化，成为世界铜鼓之乡。

四、广西铜鼓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具体实践

广西通过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促进文创产业发展，深化旅游资源开发，以铜鼓

文化为主线,将文化特色融入经济发展当中;建构文化传承体系,扎根学校,将河池铜鼓文化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和认知;建设少数民族村寨,厚植本地文化根基,不断融合共建多彩乡村,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

(一)深化铜鼓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各民族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1. 促进文创产业发展,彰显各民族共享的铜鼓文化符号。活跃的文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跳动的脉络,文创产品进入市场的过程,就是中华各民族有机融合的过程。^[36]非遗文创不仅仅是商品,更是集文化、历史、艺术于一体的实物载体。河池市铜鼓文化保护实验区选择工艺精湛、有市场潜力的项目作为试点,建立传统工艺工作站。传统工艺工作站由高校、企业和地方政府联合组建,以传统工艺为基础,以研培工作为主要内容,以保护传统工艺为前提来进行工艺的创新和市场保护。广西博物馆开发的铜鼓文化系列产品,如铜凤灯、翔鹭纹铜鼓等,将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生活场景有机结合,展现了广西地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累蹲蛙茶壶、三羊开泰茶叶罐、青花竹节套杯等瓷质系列产品,在纹饰设计中融合了灵山型铜鼓的累蹲蛙造型,将陶瓷文化与铜鼓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传递了多子多福、吉祥幸福、风调雨顺、作物丰收等多种祝福,既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瓷器工艺的卓越,还蕴含了“祥瑞”“庄严”等吉祥尊贵的寓意,这些产品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由此可见,文创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和认同感。在文创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过程中,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元素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和传承,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特色得以融合,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体验。这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魅力和文化自信。通过文创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还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2. 打造铜鼓文化旅游品牌,传播民族文化自信。2020年,习近平在文教卫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36]在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中,宜州市市民文化公园通过展演、展销、直播及图文展板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示了铜鼓文化非遗代表性项目,突出展示了河池市非遗保护工作“非遗+旅游”“非遗+乡村振兴”优秀实践案例成果。此外,河池市还启动万人游河池活动暨跨省游首发团发车仪式,组织区内外游客深入实验区(宜州区、南丹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参观、体验铜鼓文化,感受河池浓厚的少数民族风情,响应并落实自治区跨省旅游开放的政策。通过举办蚂拐节、年街节、祝著节等民族节庆,开展与铜鼓文化相关的传承保护活动,坚持以群众为主体进行活态传承,让铜鼓文化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

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少数民族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的互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铜鼓文化旅游产品的推出和开发,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览和体验,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例如,河池市第二十届铜鼓山歌艺术节,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近10万人次,为当地的旅游产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

(二)培育中华文化认同,文化振兴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建构铜鼓文化传承体系,共传共享千古文明。铜鼓文化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和历史遗产。因此,保护和传承铜鼓文化不仅仅是一件文化事业,更是一项民族事业。传承涉及必不可少的因素包括传承主体、传承空间和传承机制。传承主体包括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民间艺人、社群(班、组、社、队等)和相关组织等。在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内,聚集了众多代表性传承人群体,同时,还有一大群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者和铜鼓文化的爱好者。在这个区域内,各民族群众积极践行传统习俗,体现了该区域内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

泛的社会基础。目前,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人、自治区级传承人85人、市级传承人135人,传承人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为铜鼓文化及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基础和支撑。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艺,并在不断传授和推广中,将铜鼓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

传承空间是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赖的场所和自然、人文景观,如社区、歌圩、作坊等传统的文化空间,以及各类传习所、展示馆等传习机构。^[37]为将不同地域的铜鼓文化资源有机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文化连贯的区域,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制定了全面规划,以综合布局文化资源为重点,采取点面结合的整体性和活态性保护措施,使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体验和了解铜鼓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保护区规划了专门主题的文化带、文化走廊、文化圈,作为保护区中层支撑系统。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立档、保存、研究、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采取各种措施落实整体性和活态性的保护原则,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相关的自然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一并进行保护。其中,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数据库,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建档、宣传和传播提高到一个新的技术水平。数字化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主,也涉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数字化传播。

传承机制则是传统技艺、民间习俗的传承方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约定俗成的方式。在保护实验区内,有多元化的传承机制,项目具有的特殊传承机制应予以保护。保护区内的相关组织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节庆,如铜鼓山歌艺术节、“非遗进校园”等,推动铜鼓文化的普及和传播,营造了良好的传承氛围。同时,他们还定期开展相关培训和交流活动,为铜鼓文化及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切实的支持,激发了群众对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热情和积极性。

2. 扎根学校,以铜鼓文化纽带铸共识。学校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平台。作为扎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教育学校,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在招收学生、

课程设置、教材出版、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注重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该校在校学生中就有瑶、苗、仫佬、彝、壮、汉等6个民族的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85%以上。^[38]为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学校在铜鼓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利用乡土文化资源,建设的民族艺术(东巴凤铜鼓艺术)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注重铜鼓文化创新,积极引领学生认识、热爱铜鼓文化。学校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和教学一线的教师的合作,将铜鼓文化纳入教材内容中。编写了校本教材《铜鼓文化与铜鼓演奏》。学校开设铜鼓文化与铜鼓演奏、铜鼓舞蹈等课程,聘请铜鼓山歌文化大师及铜鼓文化艺术专家带领学生习得铜鼓演奏技艺。同时,学校还成立了铜鼓艺术协会,在学校内组织相关的兴趣小组和团体,组织学生参与当地特色节庆活动,并资助这些社团进行的展演和交流活动。他们曾将铜鼓文化和刘三姐文化进行融合,制作出壮语版的《敲起铜鼓谢党恩》,被央视、新华网等平台转播,展示了河池市铜鼓文化的风采。

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在铜鼓文化传承与保护、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通过文化纽带,把各民族师生“系”在一起,积极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不断创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相融合,为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近年来,河池市43所中小学校及3所职业院校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活动,吸引了超过2.5万名学生的参与,为铜鼓文化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阵地保障。

(三)助推各民族互嵌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

1. 建设少数民族村寨,丰富铜鼓文化场域。村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单元,民族旅游村寨中少数民族居民与外来游客频繁互动,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场域。^[39]弄宁原生态瑶族铜鼓民俗村,坐落于“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是东兰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旅游区的重要景点和景区,2022年被国家民委授予“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称号。该村的瑶族铜鼓舞是其主要民族文化,该舞蹈以猴的动作为主要表演形式,以敲击铜鼓为主旋律,因此被称为猴鼓舞。瑶族铜鼓舞最早出

现于元明时期的文献记载中,是东兰县瑶族支系布努瑶所传承的民间舞蹈。该村保存有10面传世铜鼓,其中最热闹的节日之一是“祝著节”,每年都会举行铜鼓舞、赛马、斗鸟、射箭等多项民间传统文体活动。

在弄宁原生态瑶族铜鼓民俗村,少数民族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的频繁互动,不仅使得铜鼓文化得到更广泛地传播和推广,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加固。在这个村寨中,游客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到瑶族居民的生活和文化,了解他们的传统习俗、民族服饰、民间音乐和舞蹈等,体验到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风貌。而当地村民则通过与游客的互动,了解到外界的不同文化和观念,增强了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人们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流和学习,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平等、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这种互动不仅仅是文化上的交流,更是民族认同和归属感的共同建构。

2. 厚植铜鼓文化根基,融合共建多彩乡村。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保护区将非遗保护传承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在建设中厚植非遗文化元素,通过将少数民族的铜鼓文化、蚂拐文化等元素融入建筑改造中,以非遗文化为道路命名,例如巴畴新城的铜鼓路、歌圩路、简噎路等街道,扩大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交流。这一做法不仅有利于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起到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和凝聚力的作用,同时推动村寨整体面貌提升,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依托本地的文化资源,提出“队伍组建+”模式,探索寻找民族民间文化宣传员和组建非遗传习志愿者服务队等方式,组织开展民族文化会演、山歌对唱等活动。同时,建立非遗保护民间组织和引导相关企业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传播工作,现拥有志愿者214名,成立了东兰传承铜鼓文化协会等19个民间组织、协会,共为60个乡镇(社区)、180个村屯提供非遗保护传承、讲座等服务。实验区建成铜鼓文化传承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展示中心等传习场馆,并在基层建设了铜鼓山歌亭、铜鼓舞台等展演场所,进一步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让更多民众了解和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实验区的做法是在尊重和保

护非遗文化的前提下,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融共生,进一步加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

五、结语

人类学大师克拉克洪(clyde kluckohn)曾在《人类之镜》一书中提出,“人类学为处理当今世界的决定性的困境提供了科学基础,那就是:外表相异、语言不通、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如何和平共处?”^[40]费孝通先生则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描述一种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其深刻内涵与中国“和合共生”的古老智慧遥相呼应,也与“文化共生”的现代理念不谋而合。文化共生即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背景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过程,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则是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进步,形成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生态,共同维护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铜鼓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铜鼓之乡”河池市的骄傲和特色。铜鼓作为一种古老的乐器代代相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既是文化延续的象征,反映了当地的历史、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符号,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和共同发展。在新时代,铜鼓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多元的形式走进人们的生活,为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探讨河池市铜鼓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共生,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交融与发展,全面展示广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广西民族博物馆铜鼓展厅《万千图像》,调研者:李星莹,2023年4月1日。

②核心区为东兰县、南丹县、天峨县,次核心区为巴马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延伸区为:金城江区、宜州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凤山县。

③“萨欧别”是白裤瑶语的译音,意思是“取名字”。

参考文献:

- [1]吴德群.功能创新与结构“移植”:壮族铜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9(5).
- [2]河池市统计局.人口[EB/OL].(2023-04-26)[2023-05-08].<http://www.hechi.gov.cn/zjhc/qhrk/t5458266.shtml>.
- [3]央视网.河池“三中心一馆”宣传优秀民族文化[EB/OL].(2016-11-28)[2023-03-18].<http://news.cctv.com/2016/11/28/ARTIsdh0PDsEiEQi69liVvI4161128.shtml>.
- [4]张晗.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 [5]尹博.基于文化共生理论的渝东南学校民族教育发展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5.
- [6]瀚海鲲,哈建军.多元文化共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甘肃社会科学,2021(1).
- [7]方望,明珠.多民族文化共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
- [8]么加利,付倩.文化共生观照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逻辑[J].广西民族研究,2021(4).
- [9]梁军,史钰泽.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格局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J].高校后勤研究,2022(7).
- [10]韦亮节,黄家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文化向度:以广西乡村壮汉语言共生现象为例[J].民族论坛,2022(2).
- [11]韩建业.中国青铜时代始于四千多年以前[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9-23(06).
- [12]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 [13]李昆声,黄德荣.论万家坝型铜鼓[J].考古,1990(5).
- [14]彭适凡.论扬越、干越和于越族对我国青铜文化的杰出贡献[J].东南文化,1991(5).
- [15]袁华韬,万辅彬.中国青铜冶铸技术发展对铜鼓的影响[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1).
- [16]赵腾宇.西江流域铜鼓文化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7.
- [17]陈其复,黄振良.田东县出土两面“万家坝”铜鼓,填补了广西铜鼓发展序列的空白[J]//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1993(9).
- [18]覃利奎.骆越青铜文化初探[J].广西民族研究,1986(2).
- [19]蒋廷瑜,兰日勇.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诊[C]//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1985.
- [20]蒋廷瑜.粤式铜鼓的初步研究[C]//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0.
- [21][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2][元]脱脱,等.宋史·卷494:蛮夷二·南丹州[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3][唐]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24][清]张廷玉.明史·卷212:列传100[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5]蒋廷瑜.广西风物图志:第1辑·铜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26]万辅彬,邹桂森.关于建构铜鼓学的思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2).
- [27]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 [28]吴崇基,罗坤馨,蔡荭.古代铜鼓装饰艺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 [29]谢圣纶,修,古永继,点校.滇黔志略:卷27[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 [30]朱国桢.涌幢小品[C]//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31]孔含鑫.鲁迅校勘古籍《岭表录异》与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铜鼓文化[J].世界宗教研究,2016(6).
- [32]谭晓璇,阳云.激发传统文化新活力 绘制传承保护新图景[EB/OL].(2020-10-30)[2023-04-06].<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01032522-1.htm>.
- [33]吴才泽.河池壮族铜鼓习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 [34]马彪.广西河池民间铜鼓制作工艺传承与创新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4.
- [35]徐滢洁.民族文创产品助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研究:以湘西苗绣为例[J].民族论坛,2021(3).
- [36]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23(02).
- [37]刘柯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管理行为研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5.
- [38]潘剑,黄忠益.扎根红土地 共铸民族情:河池市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建校65周年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纪实[EB/OL].(2022-11-11)[2023-03-18].<http://www.hcwang.cn/5616.html>.
- [39]蒋彬,王胡林.民族旅游村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基于川西北上五村的田野调查[J].民族学刊,2022(6).
- [40][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M].黄剑波,方静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